

淮南抗日根据地——

插入敌后的利刃

■许 斌 周 一



位于安徽省淮南市的新四军纪念林。

资料照片

被迫撤军，并同意了我方提出的以淮南铁路为界分区抗日的建议。

挺进淮宝，建立民主政权

在我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活动在安徽、江苏一带的国民党顽军李品仙、韩德勤等部已不敢轻举妄动。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抗战大局出发，确定了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基本方针。位于淮南抗日根据地东侧的淮安、宝应地区（即淮宝地区），地处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的中心地带，长期被敌军占据，严重制约了我根据地的发展。为贯彻向东发展的战略意图，打通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并有效解除华中地区的后方威胁，新四军决定集中第4、第5支队主力，向淮宝地区实施战略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0年8月，新四军第5支队司令员罗炳辉指挥第8、第10团及第4支队第7团强渡三河，成功突破顽军防线，进入淮宝地区。此前盘踞于此的顽军韩德勤部，因在前期的战斗中屡遭我军重创，尚未与我军正面接触便仓皇撤退至京杭大运河以东。然而，韩顽并不甘心轻易放弃淮宝地区，遂暗中扶持地方会道门武装小刀会留守该地，不断骚扰我军，阻挠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小刀会原是一个封建会道门组织，其成员多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小手工业者或无业流民等社会底层群众。在极少数封建顽固分子的蛊惑和蒙蔽下，这些贫苦百姓被迫参与或攻击共产党、新四军的反动武装中。从本质上说，这些成员并非坚决反共、反抗战，而是因战乱频仍、生计艰难的特殊历史环境，为生求生存而受人摆布的伤害者。因此，新四军在防御作战中，多次强调要重点打击顽固的封建反动分子，尽量避免伤害这些被裹挟的群众。

有鉴于此，挺进淮宝的新四军各部

迅速展开部署：一方面抓紧时间修筑防御工事，另一方面组织宣传队深入乡村开展抗战动员。当小刀会向我军阵地发起骚扰时，部队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由各部队挑选的特等射手精准打击顽固分子骨干，同时对多数受裹挟的成员以劝退为主，引导其返乡务农。在初步站稳脚跟后，我党立即着手建立地方党政机构，选派经验丰富的干部担任县委书记和办事处主任，带领群众开展政权建设、政策宣传、生产自救和地方武装组建等工作。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使新开辟的根据地迅速稳定下来，更以严明纪律和务实作风赢得当地群众的广泛赞誉。

为民出击，血战日伪强敌

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的皖东部队整编为第2师，由张云逸兼任师长，淮南抗日根据地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随后两年多时间里，部队以根据地为依托，沿津浦铁路两侧进行多次反“扫荡”作战，既有效保卫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又给予日伪军沉重打击。1943年初，新四军第2师师部移驻来安县大刘郭，随后成立淮南军区，其领导机关由第2师兼任，罗炳辉接任师长兼军区司令员。

1943年8月14日，对六合地区进行季节性“扫荡”并抢粮的日伪军抵达八百桥，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掠夺活动。第2师第5旅第13团奉命进行阻击，保卫群众秋收。鉴于敌军有备而来且装备占优，全歼难度较大。团部决定采取诱敌战术，在桂子山设伏迟滞敌军，确保群众秋收安全。

17日拂晓，第13团2营和侦察队占

领八百桥与四合墩之间的桂子山，侦察队继续向八百桥方向侦察前进。17日晨，日伪军400余人向四合墩方向进犯，途中与第13团侦察队遭遇。侦察队且战且退，把日伪军引入桂子山。4连在无名高地，5连、6连在丁家山头，均构筑了简易野战工事。9时，一场争夺山头的战斗激烈展开。日伪军凭借火力优势猛烈攻击。4连阵地反复争夺，全连只剩下20余人，仍坚持在无名高地上。5连、6连在丁家山头也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子弹愈来愈少。当日伪军再次逼近阵地时，5连、6连全体指战员一齐跳出工事，或高举马刀，或端着刺刀，高声呐喊冲入敌群，与敌展开殊死搏斗。整个桂子山一片刀光火海。日伪军为新四军的声威所慑，军心动摇，连续施放毒气，狼狽撤下阵去。此时，第13团1营、3营及旅特务营先后赶来增援，多路发起冲锋，把日伪军压缩至桂子山下的几个小村里，但由于兵力不足，未能一鼓作气将敌全歼。21时，残敌乘夜潜逃。此战，新四军共毙伤日伪军180余人。此后，日伪军再不敢轻举妄动，路东局势渐趋稳定。

1945年8月，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对淮南地区及津浦铁路沿线的日伪据点发起全面进攻，先后收复定远、来安、盱眙、六合等县城和广大农村，并适时渡过长江，兵临南京城下。抗战时期，淮南军民共歼灭日伪军2.5万余人。至1945年9月，淮南抗日根据地共建立2个专员公署、17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解放人口300余万。新四军第2师也从最初东进时的一个仅有3000余人的游击支队，发展为5万余人的主力部队，成为新四军部队在华中地区越战越强的典型代表。



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



中国航海博物馆展出的春秋时期吴国大翼战船模型。

资料照片

形体高大，装饰华丽，装备齐全，相当于后世海军舰队中的旗舰。

史书记载的公元前549年的吴楚水战，是我国关于水战的最早记录。此战中，吴国成功抵御住楚国筹备多年的舟师进攻，使其无功而返。公元前525年的长岸之战中，楚军大败吴军，并一度俘获象征吴国王权的餘艎战船。被楚军缴获，实乃吴国舟师之大辱。吴帅公子光派勇士伪装成楚军，深夜潜入楚营，在混战中重夺餘艎而归。公元前514年，公子光即位成为吴王阖闾后，任用伍子胥整顿军备。当时各国已积累步车协同作战经验，而新兴的舟师水战正在发展。伍子胥建议仿效陆军训练

水军，建立纪律严明的舟师体系。此后吴军舟师实力提升，多次击败楚军甚至迫使其迁都。公元前485年，吴将徐承率舟师从海路奇袭齐国，虽因不熟悉水文及战术失误而败，但此役作为中国首次海战，展现了春秋末期舟师装备与航海技术的发展水平。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水军与战船技术发展的关键阶段。当时，以吴、越、楚为代表的南方诸侯国和以齐、越为代表的沿海国家，在长期水战中不断改进战船功能与形制，并创新水战战术。这些实践不仅形成了水战的基本战术原则和舰队编成模式，更为后世水军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淮南抗日根据地位于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东起京杭大运河，西至淮南瓦埠湖一线，北临淮河、南濒长江，是党领导的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创建的一块重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内贯穿淮南铁路和津浦铁路，北部的淮宝地区恰好是华北日军与华中日军的战略结合部，附近的扬州、徐州是其重要屯兵据点，而向南隔江相望的，正是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和汪伪“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

从敌我态势来看，新四军部队控制淮南一带，不仅能掌控淮南、津浦两条铁路和长江、淮河两条河道，从而切断侵华日军的南北联系，还能对敌军在战区内的活动形成制约。因此，消灭淮南新四军一直是附近敌军的重要作战目标之一。更严峻的是，根据地西南方向的立煌县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当地的国民党顽固派及地方势力对新四军及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始终虎视眈眈，直接威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安全。

强力反顽，稳定淮南局势

1939年，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政策，并在当年底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华中地区，蒋介石密令李品仙、韩德勤等部顽军，以津浦铁路为分界线，分别进攻路西、路东的新四军第4、第5支队，企图将我军消灭于江北一带，并夺占淮南地区。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在淮南应有严正的态度对付一切摩擦，在有利有利的条件下，亦应给武装进攻者以反击”的指示精神，先将江北指挥部前敌委员会改组为皖东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各部队，并立即开展扩军、整训、动员等工作，随时准备应对敌顽的进攻。

1940年3月，国民党顽军李品仙部兵分三路，向新四军第4支队和位于定远附近的江北指挥部进犯。中共中央中原局在掌握敌情后，决心趁东面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暂未起兵的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消灭来犯之敌。一方面，命令第4支队各部做好迎击准备，并择机长途奔袭敌军老巢定远城，诱其回援；另一方面，命令路东的第5支队火速西进，配合第4支队共同完成歼敌任务。

3月4日，敌军一部进至界牌集一带，进攻我第4支队第7团的防御阵地。由于准备充分且有地方群众配合，第7团官兵主动发起冲锋，迅速将来犯之敌击溃，迫使其后撤。7日，越过津浦铁路向西增援的第5支队，在行军路上与敌军一个保安团遭遇。指挥员马上命令部队展开战斗队形，不到一天时间就把这个团全部歼灭。与此同时，奔袭定远城的部队也传来捷报，敌军主力在回援的路上进入我军埋伏圈，损失惨重。战斗结束时，李品仙部被消灭三分之一，

乘风破浪向江海

——中国古代战船（上篇）

■曹 波

水战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海战，是世界战争史上重要的作战形式。我国也是最早诞生水军的国家之一。早在春秋时期，史料就有大规模水战的记录。得益于造船业的兴起，中国古代战船发展迅速、种类繁多，逐渐出现江海两用乃至专门用于海上作战的战船。这些战船成为平定海患、保卫海疆的神兵利器，为中国古代海军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古人就开始创造竹筏与独木舟等水上交通工具，以跨越江河湖海。20世纪70年代，我国考古人员在河姆渡遗址中，挖掘出8支木桨、1只微型陶舟模型和大量水生动物遗骸。这次考古发掘证明，早在7000余年前，河姆渡人就已具备制造舟船的能力，使人类的活動实现了从陆地向水域的扩展。根据甲骨文中的“舟”字及与“舟”字有关的字，推断早在距今3500年至3000年的殷商时期就已出现早期舟船文明。西周时期，造船工艺进一步发展，并出现名为“苍兕”的主管舟船的官员。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处于长期混战状态，特别是在水路纵横的南方地区，水战逐渐成为主要作战方式。在此背

景下，楚、吴、越等国纷纷建立庞大的舟师（即水军）。其中，吴国凭借其濒江临海的独特地理优势，造船实力最为雄厚，其战船种类繁多，包括大翼、中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

大翼作为主力战船，分上下两层甲板，上层为士兵战斗区，下层为划船区。该船采用狭长船型设计，长12丈、宽1丈6尺，配备近百名士兵，其中50名专职桨手的配置使其具有显著航速优势。中翼船体长9丈6尺、宽1丈3尺，编制与职能类似大翼但规模较小，通常作为配合大翼执行任务的辅助型战船。小翼船体长9丈、宽1丈2尺，体型较小、机动性强。作为古代海军装备的标志性装备，大翼与中翼、小翼共同构成吴国水军的核心战力，其建制模式对后世战船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楼船的显著特点是船体上层建有多层木楼，用于侦察眺望，也可搭载弓弩兵进行俯射。突冒则以其船船的冲角，成为撞击敌船的有力武器。桥船作为灵活轻快的小型战船，在水战中可用于冲击敌阵，往来游击。除上述战船外，吴国还有一种专供国君乘坐的指挥船，称作餘艎（亦称余皇）。该船作为指挥船，



抗战烽火中的红色报刊

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里，涌现出许多承载时代使命的报刊。其中有一份报纸，历经战争局势的跌宕起伏，数次停刊又艰难复刊，始终作为党中央的“喉舌”，向大众传递党中央的声音，在战火纷飞中，为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斗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提供舆论支撑与精神动力。毛泽东同志曾评价它是“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这份报纸便是《新中华报》。

1931年，随着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包围与文化封锁。面对这一局面，如何在更大范围内获得群众认可、加緊巩固苏维埃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紧迫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不仅要打破敌人军事“围剿”，还要突破新闻封锁，打破敌人文化“围剿”。1931年12月11日，在党中央和苏区政府支持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前身）在江西瑞金创立。这份报纸自诞生之日起，便肩负起一系列关乎革命事业的重要使命，不仅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介绍中央苏区的建设成就和实践经验，及时传播红军反“围剿”作战的捷报，还要开展舆论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等反动势力进攻革命、蒙骗工农的阴谋行动。凭借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切实有效的指导，报纸发行量持续增长，从最初3000余份增至最高时达4万余份，成为辐射整个中央苏区的舆论中心。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的瞿秋白继续主编《红色中华》。在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出版若干期后，《红色中华》暂时停刊。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该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开启了报纸在黄土高原上的全新篇章，继续以笔为枪传递革命声音。

1937年1月29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响应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部署与政策调整，适应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承载起传递党的抗日主张、凝聚各方抗战力量的重要使命。1939年，由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及国民党政府内部推行“溶共”“防共”和“限共”方针，为更有力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改组为由中共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机关报，启用新的期号——“刷新第一号”接续出版。自此，《新中华报》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作为抗战时期党中央的“喉舌”肩负起代表党中央发声的首要任务。

抗战期间，《新中华报》系统刊载了敌后革命根据地各类政策文件、党中央以及边区政府领导的专题社论和重要评论文章。报纸刊印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等规章政策，深入阐释了党开展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制度规定，报道了民主普选运动，提升民众政治意识，将党的方针和主张送达千家万户；发表了《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完成征收一万亩石救国公粮》等社论，有力推动了救国公粮运动的顺利完成，确保军队的物资供应，为长期抗战提供了支持。同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多位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挥笔著文，围绕党的主张、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及抗战形势等主题，作为主要撰稿人在报上发表诸多重要文章。毛泽东同志的《祭黄帝陵文》《抗大三周年纪念》《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新民主主义论》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著作，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抗战舆论与党内思想，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根基和舆论基础。

此外，报纸还接续报道了抗日战场上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一大批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以翔实的战况和英勇事迹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深入介绍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情

《新中华报》——

烽火中传递党中央的声音

■王流选 张育豪 杨润鑫

况，包括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普及和人民群众活动内容，展现边区在党的领导下欣欣向荣的面貌，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实践经验与榜样；抨击揭露了以汪伪政权为代表的投降主义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行为，旗帜鲜明地维护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领导方向；持续跟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新动态，及时刊发欧洲、太平洋等战场的消息……这些报道有力塑造了我党作为抗日事业中流砥柱的形象，为赢得抗战胜利和社会认同奠定了重要基础。

不仅如此，报纸还将党的革命思想、政策主张与奋斗目标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歌谣、诗歌诗词、标语口号、漫画木刻画、戏剧话剧、谜语秧歌等大众化艺术形式之中，创作了《全国人民巩固统一战线》《现在，我们一致对外吧！》等系列拥护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主题的主题漫画，诠释了团结抗战的必要性，刊发了如仿“张生嬉莺莺调”的《合力打日本》、仿上海小调创作的《保卫华北小调》等大量改编自民间曲调的新编民歌，极大激发了全民抗战的热情。这些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凸显灵活性、多样性、大众性，极大增强了宣传的感染力和渗透力，让党的声音深入人心。

1941年5月16日，随着敌后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党中央为强化全国宣传指导，将完成阶段性历史使命的《新中华报》（5月15日停刊）与《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从《红色中华》到《新中华报》，在近10年的历程中，这张报纸记录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也见证了我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光辉历程。作为党中央的喉舌，《新中华报》始终坚决传达党的政策主张、动员群众、激励斗争，在国土沦陷、民众迷茫的至暗时刻，将党的声音和抗战的希望传递给广大中华儿女，以抗战必胜的信念引领全国人民一步步走向胜利。



1939年出版的《新中华报》“刷新第一号”。

资料照片